

袁玲红：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和谐发展观

袁玲红

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在后现代思潮下以女性视角来考察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提倡在生态觉悟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和谐的理论，其主要理念包括：主张适度发展，反对无限制发展；倡导女神精神生态运动；生物区域主义，构建社区性经济和社团经济的理想；这种和谐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为女性主义运动和环境伦理学做出了新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社会和谐；生态智慧}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9-0071-04

袁玲红(1971 -)，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与生态伦理学。(江苏南京 211189)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解放运动 and 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其和谐发展观在注重生存、探讨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追求男女平等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有益借鉴。

一、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的产生

概括地说，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是在后现代思潮下以女性视角来考察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提倡在生态觉悟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和谐的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是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对“现代性”的讨论是相关的。现代性理论相信理性和科学的进步，相信技术能够征服自然，相信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改革，就能控制和改善人类的状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改变，现代性理论日益面临窘境，于是，西方学者们选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现代性还未退出人类发展的舞台，而崭新的社会状况还未到来之时的“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洞察到理性形而上学背后隐藏着狂妄和极权性的话语霸权，进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福柯喊出“人之死”，德里达提出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罗蒂、格里芬等人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倡导“创造性”，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倡导对世界的关爱。生态女性主义的和谐发展伦理思想深受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杨通进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具有后现代倾向。“生态女性主义不是把环境危机当作一个孤立的、能单独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而是把它当作现代性危机的一个征候来理解。在始们看来，现代性本身就是当代的环境危机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批判和超越现代性，走向生态后现代主义。”

妇女解放运动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传统的父权伦理往往把妇女看成男人统治的

工具，贬低女性价值，使得女性成为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一般来说女人是低男人一等的”。女性主义认为传统正义伦理理论渗透着男性的意识，代表了男性的利益，充满了男性的话语霸权。正义伦理支持抽象的个体论，使道德主体与他人的关系分开，使人与人之间成为陌生的关系，进入抽象的契约领域中，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对男性来说，“分离和个性化与性别认同有着重要的联系”，故而正义伦理本质上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它在认识世界方面是“自我——他者”式的，注重权利、地位、权力之间的竞争，把他人当作是地狱，使用的是强权和强者主宰的秩序话语。生态女性主义坚持一种关怀和合作的伦理，认为，关怀发生在关系中。自我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处于关系中的自我或关系自我。因此人的自主性不是独立的自主性而是关系自主性，相互依赖的自主性。当人把他者当作是与我共生的存在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便摆脱了占有式、对抗性的关系，而成为共生共享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生态女性主义把道德的自我看作是为责任和关系所束缚的自我。与伤害、破坏自然的“男性气质”相对应，生态女性主义赞美关爱、养育和保护“女性气质”。

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也是“生态的”，它的产生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息息相关。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感召下，人们认为科学力量可以通过扩大自然界“限制”的边界来改善人类命运。这种观点支持人们自由地支配外部环境，其必然结果是：对科学知识以及作为其物化形态的物质财富的单向度追求，破坏了人类的精神家园。20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从生态的角度看，正是男性“刚强”、“成功”的神话伤害着生态环境，因为它不断追求发展、鼓励“战胜自然”，将不断“猎取”、不断收获作为第一法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反军国主义运动令女性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相遇，二者在对话中发现压迫女人和毁坏环境的是同一种力量，于是便在合作中共同反抗压迫的逻辑本身。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为由妇女所领导的生态运动会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促使男女之间的公平真正实现。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将保护环境视为自己的使命，并把人当作“生态的人”来理解。

二、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的理念

(一)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社会和谐需要适度发展，反对无节制的发展

发展意味着美好生活的某一特定形象，发展被认为是使人们摆脱无知、苦难和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然而古莱预测，根据任何未来或然性的理性计算，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事业注定要失败。……很可能的是，技术和资源差距会继续扩大化，而大量资源将继续用于毁灭性武器的挥霍消费。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主义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带来的是“我们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他主张摸索出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看来是“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生态女性主义接受了这种关于“限制发展”的思想。

首先，社会和谐发展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生存。生态女性主义对发展的概念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发展这个概念是基于西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关于经济进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以为变革必须走线性发展的道路。从文化的角度上讲，这个概念“不仅带有霸权主义特征，而且与女性运动所强调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去听从无权者的呼声，尊重差异性；而发展概念不重视个体，不重视社区层面，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不考虑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生态女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对于环境具有破坏性的思想，认为当前西方父权制式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深了对女性与自然的双重统治，它从生存的高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联。一方面，自然需要得到人类的爱护；另一方面，所

有女性在保护自然上有共同利益。男人和女人都应培养如关怀、同情、慈祥 and 养育等美德。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互惠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男人和女人都应以生存必需为视角，消除所有威胁毁灭地球的实践和制度，极力倡导人们过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生活。

其次，社会和谐发展必须获得尊重。由于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成功紧密相关，掌握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人们往往越来越受到尊重。有些国家疯狂追求发展而有些国家抵制发展创新，都可以从对尊重的普遍需要得到说明：前者追求发展为得是获得发达国家享有的尊重，后者抵制发展是因为它们不受物质生活水平影响的自身价值标准大大受到伤害。许多发展中国家拒绝套用美国等发达国家使用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也抵制现代性模式所使用的技术进步观念，宁愿按照自身条件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化实际上是假象掩饰之下的依附性发展。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与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反过来也一样。但是，这并不能促使发展中国家赶上或实现现代化。因为不发达国家是发达国家存在的必然对立面。它是将财富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从边缘向中心地区转移的一种方式。旺达娜·席瓦(v. Shiva)在《发展，作为西方父权制的新计划》一文中，揭示了西方的发展模式造成的贫穷。她指出所谓第三世界劳工是进步和工业化模式的结果，这种采用于殖民时期并持续到现在的模式是发展不良的根源。它碍于妇女对农业、土地和社群活动进行传统上的适当了解，也破坏了第三世界地区生态的持续性。席瓦提出立足本土知识体系重建女性主义的生态文明，并与基层妇女的环保运动联系起来。

再次，社会和谐发展与实质自由息息相关。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与那些狭隘的发展观，诸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森把发展的目标看做是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一切世俗性(甚至神圣性)的价值目标都从属于人类幸福，森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实质自由。在她那里，实质自由指“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等初步的可行能力，以及关系到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发表不受审查的言论等等的自由”。实质自由包括法治意义的自由(但不限于权利)，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生态女性主义者批判了西方式的恶性发展观，认为它带来了人类的实质不自由，从而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即承认自然界中的生命(包括人类)是通过合作、相互照料和爱来维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尊重和保持所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其文化的表达，作为我们幸福的真正源泉，因此，我们应有一个更仁慈地对待自然、妇女、儿童和男人的社会。

(二)生态女性主义为社会和谐发展从正面提出建设性的策略取向

其一，提倡女神精神生态运动。现代科学社会，各个知识领域日渐分化和专业化，形成了人的角色专门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人们因为行为远离了意义和价值而变得身心疲惫与沮丧。人类探索意义有三大领域：自然、历史或宗教领域。丹尼尔·贝尔认为，人类行为的指南不可能在自然界，因为自然仅仅是从一端构成了物理的局限，而另一端集中了有关人类生存的问题。人类并没有可供参考的地图能在这两极之间摸出一条光明大道来。同样，人类行为的指南也不可能是历史，因为历史没有意向，它只不过是工具性的，是人力向自然的扩张。这样，就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宗教。贝尔倡导复兴宗教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共有情操和感情纽带，保持道德意识的连续性。而生态女性主义针对信仰危机带来的社会分裂和生态破坏，提出了女神精神生态运动。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斯普林特纳克看来，女神精神生态运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神性(宇宙的创造性或者终极秘密)置身于我们自身和我们周围的宇宙过程之中，宇宙是一个神圣的整体，并有着无限的复杂性；第二，强调内在力量的获得(enpowerment)，从而把人类从自身对生命

的孤独感和冰冷的物质意识的牢笼拯救出来；第三，从存在的死亡感(它是父权文化的根基)走向再生意识。女神精神生态运动呼吁给予大地和女性应有的尊重，从而提醒人们对沉默受伤的自然与有限容纳能力的生态环境的普遍重视。

其二，主张生物区域主义，倡导构建社区性经济和社团经济。生态女性主义吸纳了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将独立发展与生物区域主义结合在一起。塞尔制定了生物区域主义的四个原则。包括：一是解放自我。二是发展一个走向自立区域的潜能。三是认识土地。四是学习习俗。生物区域主义不同于当今的“工业—科学范式”，高估“自然体系”使之成为培育和维持我们精神的重要源泉。在社区中，人类扮演着“耕种者和守望者”的角色，社会崇尚简朴的生活模式，产品主要是为了自用而不是为了市场生产。皮特勒(1991)称这种经济为“初始经济”(primary economy)。初始经济提倡自力更生，并鼓励社会在当地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可持续地生存。生态女性主义还主张社团经济的理想，即财富和所有权尽可能广泛分布，这种权力的分工将会促进社会平等、效率、福利和安全，与日益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权力和控制力形成鲜明对比。对生态女性主义来说，仅仅修改生活规模就将从根本上解决许多“咄象的和理论的难题”，因为在小的共同体中，人们将会看到他们自己行为的影响(例如对环境的影响)和他们改过自新的实践智慧。此外，正如帕普沃尔兹提出的，它将反对破坏和支持人类创造力的发展：“能够牵制侵犯行为和解放人类创造才华的唯一(权力)形式，不是联合的权力而是平等地被分割的权力。”

三、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的困境及启示

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提倡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差异性的生态文化，以取代“全盘西化”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它重新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生物的关系，将人看成一种生态存在，提倡爱、关怀的伦理价值，以相互依怙模式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分离状态，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提升了女性主义运动和环境伦理运动的品位。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日益被人们认同的今天，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更具现实意义。生态女性主义的和谐发展观对我们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富有启发：现代性带来人口数量的剧增和欲望的膨胀，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攫取导致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下降及地球生态系统被破坏，给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减少人口数量、节制欲望和坚持社会正义就成为缓解自然危机和建立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

然而，生态女性主义的和谐发展观也存在一定困境，以小为善对抗工业化社会规模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乌托邦色彩。首先，在于它关于适度发展的设想，要求人们通过适度的消费来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不切实际。适度消费需要克制过多的欲望，而现代技术的产生则迎合了人的欲望与需求，技术在满足人类欲望的同时又激发了新的欲望，使人沉溺于欲壑难填中永不满足，适度消费只会停留于理念中而很难落实到现实中。退一步说，即使适度发展成了人类的实践理性，但是适度发展是否能拯救世界？李银河认为：“尽管主张适度发展和反对无节制发展的思想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它还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何谓适度。……第二，确定了适度的标准之后，如何做到使人能满足于这个标准。第三，公平问题。……为了公平，是应当让已有汽车的人放弃汽车，还是让只有自行车的人拥有汽车？这些问题不解决，生态女性主义只能是空谈。”其次，生物区域主义被认为带有环境决定论的色调。环境决定论认为，社会如何发展的不同归因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尽管生物区域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反对从环境上或生物学上引出的种族优越论和扩张理论，然而它倡导在自然的极限范围内并主要凭借在生物区内发现的自然环境的供给来生存，主张社会进程和生物进程之间的相似性，生物地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信誉不佳的环境决定论主题。最后，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依附发展模式和独立发展模式过于简单化了。依附发展忽视了“边缘地区”有可能比中心地区呈现出更高的发展速率这

一客观事实。而独立发展模式掩盖了阶级剥削因素，如一些亚洲国家通过血汗劳动为西方市场生产尖端的电子消费产品。这在政治上是糟糕的，因为如果允许剥削性生产关系存在，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独立发展模式都是不能接受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一个建立在关怀(而不是占有)、合作(而不是竞争)和情感(而不是理性自我)基础上的社会，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生存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没有一种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龚剑飞]

《江西社会科学》 2007年第9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